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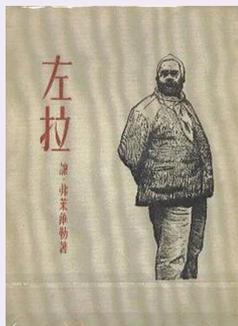
## 王道乾译作数种



让·弗莱维勒选编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》(平明出版社,195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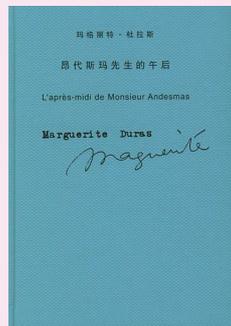
司汤达《拉辛与莎士比亚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,1979)



让·弗莱维勒《左拉》(新文艺出版社,1955)



安德烈·斯梯等《烟斗》(新文艺出版社,1957)

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《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)

◀ (上接2版)

话,饭后,有时我会陪他在社科院的院子里散散步。这也是我们聊天的时间。这样的散步聊天中,他讲过一些上海学人的趣闻,诸如:钱锺书先生在上海时便有了“两脚书橱”的雅号,他说“这样的学者不能没有,但学者也不能都这样”。

**我**第一次去王先生的家,是在1980年代中期,他的家在静安寺附近的美丽园,是上海常见的那种里弄楼房。按门牌号码找到房子的后门,门口就停放着王先生经常骑的自行车。这部自行车已经旧了,质量依然不差,好像是英国产的名牌“蓝翎”。从后门进去是几家住户共用的厨房,沿楼梯上到三楼,就是王先生家了。三楼好像有两个房间,近楼梯口的一间朝南,顺走廊向东走几步还有一间。朝南那间有一扇落地钢门,门外是小阳台。门里靠墙放了一张写字台。王先生和我就在写字台旁坐着讲话。我先说在门口看到他的自行车,问他车子是不是一直放在下面,因为当时上海经常有偷窃自行车的事发生。王先生说不是,车子到晚上就由儿子扛上楼,放在走廊里,早晨儿子再扛下去,放在门口。我说院里安排有车接送你们所领导上下班,你为什么还要骑自行车呢。王先生说,一部车要接送几个人,几个人又不住在一处,碰到有什么意外情况,等的时间更多,有次他站在弄口就等了二十多分钟,而自己骑车到社科院用不到一刻钟,“所以我就不乘他们的车了。自己骑车可以掌握时间,也是一种锻炼”。我们谈到阳台上花盆里种植的芦荟、紫罗兰等,王先生说,他种的都是生命力强的植物,不用太操心,它们也不死,“我喜欢绿色,没事就看看它们”。这时,从敞开的阳台门由外飞进屋内两只鸽子,落到楼梯口天花板下的一个凹处,咕咕咕不停地叫着。我说我小时候也养过

鸽子,问王先生这两只是不是他养的。王先生点点头,说鸽子和他特别亲,他坐在这里看书写作时,鸽子常会停到他的肩上甚至头顶上,他也任由鸽子,而对家里的其他人鸽子却不这样。说这些时,王先生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天真纯净的笑容和得意。

再一次到王先生家看望他是在1990年代初,他在三楼东侧的房间接待我。这间有一张大床,靠南窗处放一张写字台,靠西墙有不大且简朴的书橱,大概是王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吧。这次聊天谈到他的翻译。王先生说,一直想翻译几部外国文学作品,可上班时忙于公务,没有时间,退休后可以实现心愿了;有几处刊物等他的译作,他每天伏案苦干,还是难以应付。我问他一天可以翻译多少字,他说“五百,我要求自己坚持每天五百字”。我听了有些惊诧,这么著名的翻译家,对法语那么精通,而且王先生并不热衷社会交际,怎么每天只翻译五百字,也就是写满当时文学所可以领用的一张大稿纸啊。王先生一定看出我的不解,随后说,翻译文学作品不同于翻译法律、经济等著作,那类著作专用名词多,语法、表述有一定规格,熟悉了,翻译得可以快些;文学作品不同,不仅词汇量多,还涉及许多俗语、俚语、民风习俗、特定物品等等,而且每位作家还有自己的特殊表达习惯、修辞手法,要翻译得准确很不容易……。因为亲耳听到王先生的这些话,后来再看到人们称赞王先生译著、译品的文字,我没有感到惊奇。顺便提及,王先生生前遗留的未完成译稿,有些由他的公子王成或学生张小鲁续译问世了。

**1** 980年代中期,社科院院部大楼加高两层工程完工,文学所被分配到新加的四层楼西部,这时全所办公室集中在了一起。所长室在南面,外国文学室和现代文学室在北面且隔壁紧邻。1985年初夏的一天,我

在现代室看书,王先生在门口招手示意我到外国文学室。待我进门,王先生就递给我两册书,是梅桂林先生辑注的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》,说他已被批准退休,送这部书作为留念。此前,我向王先生索要过他的译著《莱辛与莎士比亚》。这次是王先生主动给我的,我没想到,接过书看着王先生,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待回过神,我请王先生在此稍等,立即跑到南面的编辑室,找到平时经常为文学所活动拍照的同事,请他为我和王先生拍了一张合影。二十多年后,我和几位同事合作编写《画说上海文学》,其中有对于王先生及其译作的介绍,显示王先生形象的照片,采用的就是这帧合影,当然裁去了我而仅保留了王先生,人像背景就是当年外国文学室的墙壁。

王先生重感情、珍视友谊,提携后进,也敬待同辈。有一年我到北京参加学术活动,王先生叫我带两条香烟给一位北京学者。到北京联系到那位学者,我到他家里,把用报纸包着的香烟交给他。他立即打开报纸,里面是一条“万宝路”,一条“七星”,而王先生自己平时常吸的是“大前门”。1980年代初期,在陈永志老师提议、规划下,我们合作进行创造社研究,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版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专门著述,我们的研究也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这期间,我们写过一篇创造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,曾呈请王先生指教。王先生看后便推荐给当时着手中国文学翻译史工作的戈宝权先生,供他参考,也请他指教。王先生在信中说:

我这两位朋友是专门研究创造社的,收集有丰富的资料,外国文学活动是他们创造社研究的一个方面。我看了他们的文章,觉得内容丰富,材料翔实,国内似乎还未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,因此,你看过文章之后,如以为尚可,是否可就近介绍给译协《中国翻译》杂志考

虑发表,以之抛砖引玉,如何?戈宝权先生很快给王先生回信,说文稿看过了,“觉得很有意思,这是研究我国文学翻译家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,而且我想还可做些对文学研究会、未名社、译文社等有关团体和出版社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,进一步作相应的研究”;戈先生还指出我们文章中两处错误,并给予具体的改正指示,要我们将修改后的文章连同他和王先生的信“一齐寄给该刊编辑部”。王先生致戈先生的信,在随文稿付邮前,我特意复印留存;戈先生致王先生信,是王先生送给我的,让我“作个纪念”。我们的那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一家学报发表。后来我研究抗战时期上海文学时,拜访过好几位当年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前辈作家如钟望阳、蒯斯曠等,也依赖王先生的介绍。

1991年,我和陈永志先生合作的《创造社记程》出版,我托人代呈王先生一本求正,很快就收到王先生的信。王先生说看到书“自觉欣悦无比”,向我们表示“衷心的祝贺”,信中还写道:

……你着手这项工作,自始我就知道,我们也曾多次谈及,就像我要写什么一样,我是很关心它的。书的内容结构严谨,序列一目了然;特别是你写的后记,谈到著书之成、真诚的学术友谊等等,读来为之心动。我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上的友好情谊一向向往之,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屡屡受挫,感慨良多,每想到这些,不免为之凄然;

质朴的风格也不妨挥洒驰骋,篇幅似亦可多方展开。……我觉得可说的话还不少,是还有写的余地的。

信中有夸奖也指出我们的欠缺不足,这当中饱含真诚鼓励与鞭策的情谊至今令我感动。

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,王先生住进华东医院,先前也听他说过他患过肝炎,这次住院也因为肝病。我到医院看望他时,他的精神很好,只比平时显出些许倦容,他还要我陪他到

医院草地散步。散步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讲肝病的书,他知道我的妻子在医院工作。我回家找出妻子在军医学校学习时的内科教材,第二天给他送去。这次医院诊断出王先生患了肝癌,并通知了家属,而医生和家属都没告诉他。大概是他猜到些什么,想自己在医书里找到可以对号入座的病症。也是在这次见面,他说,我们住得太远,你来一趟不方便,但你要答应我,半年一定要来看我一次。我当然答应,且以后没有食言,只是我能再见王先生的机会不多了。

1993年秋天,王先生再次住院,这次进的是中山医院。听到消息,我就赶到医院看他。在一间小病房里,病床旁有一对圈椅,椅子中间是一张小茶几。他穿着病号服坐在靠近病床的椅子上,我坐另一把。这次他面容明显消瘦了,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前。他说肝病加重了,要治好恐怕不可能,能缓解就可以了。他问了文学所的一些情况,然后说起退休前在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,他说得多,我说得少。他问我近期的工作,说研究上海文学历史很有意义,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,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他说早先有位资料室的同志想转到研究室工作,所务会讨论没有同意,“其实当时我同意也就办成了”,为这件并无需他完全负责的事,流露出真诚的歉意。他说到他的一位学生,要我以后给予帮助,我说这位学生比我强,他就说“那你们互相帮助”。后来这位学生远赴美国,处处比我更强。怕时间长了妨碍他休息,趁他说话间隙,我告诉他近两天要到外地去,大概一周左右返沪,他说“你回来再来看我”。我从外地返沪那天,到家已是夜晚,刚进门,妻子就说“昨天有人打电话来,说老王找你,不知道什么事。”那时上海的一般居民只能使用里弄的公用电话,王先生有我家附近公用电话的号码。

(下转4版) ▶